

国际共产主义 运动中的 党际关系史

主编 姜琦 张月明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 的党际关系史 (1848—1988)

主 编 姜 琦 张月明

撰稿者 (以姓氏笔划为序)

万中一	王志连	包文英
冯绍雷	田娟玉	孙锡安
李 明	陆 钢	杨 烨
张月明	张祥云	范 军
周尚文	赵永峰	姜 琦
鲍盛钢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沪)新登字第201号

责任编辑 王子奇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党际关系史

(1848—1988)

姜 琦 张月明 主编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邮政编码: 200062

(上海中山北路3663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

常熟高专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5 字数: 370千字

1991年12月第一版

1991年12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2,500

ISBN7-5617-0771-1/D·042

定价: 6.65元

目 录

导 论	(1)
早期共运中几种不同类型的关系	(13)
一、共产主义者同盟时期的党派关系	(17)
(一) 民主派兄弟协会	(18)
(二) 共产主义者同盟	(25)
(三) 世界革命共产主义者协会	(33)
(四) 国际委员会	(38)
二、第一国际与各种工人组织的关系	(43)
(一) 第一国际成立前后各国工人阶级的联系与合作	(43)
(二) 第一国际同各国工人组织的关系	(51)
(三) 第一国际内部不同工人组织之间的关系	(60)
三、第二国际时期形成了严格意义上的党际关 系	(66)
(一) 列宁、斯大林对第二国际组织形式的评价	(66)
(二) 第二国际组织形式的特点	(70)
(三) 社会党国际局与第二国际的关系	(76)
(四) 第二国际组织形式的重要经验	(91)
共产国际时期党际关系的历史特征	(99)
一、共产国际与西欧共产党	(103)
(一) 共产国际与德国共产党的关系	(103)
(二) 共产国际与法国共产党的关系	(127)
(三) 共产国际与意大利共产党的关系	(141)
二、共产国际与东欧共产党	(155)
(一) 共产国际与东欧各国党的建立	(155)

(二) 共产国际的失误与东欧各国党的曲折·····	(164)
(三) 共产国际的策略变化对东欧各国党的影响·····	(170)
三、共产国际与亚洲共产党·····	(178)
(一) 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	(178)
(二) 共产国际和印度共产党的关系·····	(199)
四、共产国际与美国共产党·····	(212)
(一) 共产国际与美国共产党的初中期活动·····	(212)
(二) 共产国际与美共党内斗争·····	(218)
五、共产国际与社会民主党·····	(226)
(一) 共产国际的建立与社会民主党的分裂·····	(226)
(二) “4大”以前共产国际同社会民主党的关系·····	(229)
(三) “4大”以后共产国际对社会民主党的态度·····	(236)
二战后更趋复杂的党际关系·····	(245)
一、迷离扑朔的南苏两党关系·····	(249)
(一) 情报局事件与苏南关系的破裂·····	(249)
(二) 赫鲁晓夫与苏南关系的变化·····	(270)
(三) 侵捷事件对苏南关系的影响·····	(274)
二、结冤甚深的波苏两党关系·····	(278)
(一) 战后初期波苏关系中的几个突出事件·····	(279)
(二) 从“波兹南事件”到波苏“10月会谈”·····	(282)
(三) 60年代的波苏联盟和1968年“3月事件”·····	(292)
(四) 1980年的波兰的社会动乱与苏共的态度·····	(301)
三、处在阴影下的匈苏两党关系·····	(305)
(一) 仿效苏联模式时期的匈苏两党关系·····	(305)
(二) 1953—1956年时期的匈苏两党关系·····	(309)
(三) 匈牙利调整政策和全面改革时期的匈苏两党关系·····	(313)
(四) 80年代以后的匈苏两党关系·····	(316)
四、地位特殊的德国统一社会党与苏共的关系·····	(319)
(一) “6.17”事件与苏德关系的调整·····	(320)
(二) “第2次柏林危机”和“柏林墙”·····	(324)

(三) 关于导弹部署的争论·····	(328)
(四) 德国的统一·····	(330)
五、有着重大波折的捷苏两党关系·····	(341)
(一) 战后初期捷共与苏共的关系·····	(341)
(二) 1968年苏联出兵入侵捷克斯洛伐克·····	(346)
(三) 1968年以后的捷苏关系·····	(357)
六、罗苏两党关系中的冲突与妥协·····	(361)
(一) 1944—1953年时期的罗苏两党关系·····	(361)
(二) 1954—1960年时期的罗苏两党关系·····	(365)
(三) 1961—1970年时期的罗苏两党关系·····	(370)
(四) 1971—1980年时期的罗苏两党关系·····	(383)
(五) 1981—1987年时期的罗苏两党关系·····	(389)
七、相对平稳的保苏两党关系·····	(393)
(一) 季米特洛夫执政时期的保苏两党关系·····	(393)
(二) 契尔文科夫执政时期的保苏两党关系·····	(396)
(三) 日夫科夫执政时期的保苏两党关系·····	(399)
八、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与苏共的关系·····	(406)
(一) 阿党长期奉行对外孤立路线·····	(406)
(二) 阿苏关系制约下的阿党内外政策·····	(410)
(三) 调整中的阿苏两党关系·····	(423)
九、战后西欧各主要共产党与苏共的关系·····	(430)
(一) 1945—1953年时期的党际关系·····	(430)
(二) 1953—1968年时期的党际关系·····	(438)
(三) 1968—1978年时期的党际关系·····	(447)
(四) 1978—1985年时期的党际关系·····	(454)
理论、形势和展望·····	(461)

导 论

一、一个有现实意义的课题

自从工人阶级政党相继登上各国政治舞台以后，在国际政治生活中就有一个如何处理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如果从马克思恩格斯所写的《共产党宣言》发表算起，迄今已有近一个半世纪的历史了。起初，共产主义被称作“幽灵”，只在欧洲几个发达的国家游动，马克思主义学说也只是许多社会主义派别和思潮中的一种。然而，社会现象和自然现象一样，有着它固有的自身发展的规律，随着历史车轮滚滚向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由小到大，由弱到强，其间，交织着高潮和低潮，奔泻和回流，有胜利的喜悦，也有失败的懊丧，有过惊天动地的事件，涌现出无数可歌可泣的人物。在这一条荆棘丛生的历程中，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经受了历史的严峻考验。实践证明，她是颠扑不破的真理。共产主义运动在前进道路上不管还会遇到多少艰难险阻，但历史总是朝着这一总目标发展的。中国的社会主义先驱李大钊同志曾经说过：“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世界的明天是属于共产主义的，对这一点，我们充满信心，坚信无疑。

共产主义运动在一般情况下，都是在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下进行的，因为要革命，就必须要有有一个革命政党的领导。共产主义事业从本质上说是国际的，因为全世界无产阶级的经济状况是国际的；面对的阶级敌人是国际的；他们的解放条件也是国际的。所以，马克思恩格斯一登上斗争舞台，就发出了号召“全世界无

产者，联合起来！”但每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斗争的舞台都在本国，要打倒的首先是本国的阻碍经济发展的腐朽的统治阶级，因此，共产党首先必须成为本国各族人民利益的真正代表，共产党也只有获得本国人民的拥戴，才能站住脚，才能有资格成为革命的领导者。由此，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就有一个党与党的关系问题。

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党际关系问题，应该承认，在理论上我们过去过于理想化了，总认为，大家既然目标一致，根本利益一致，指导思想一样，因此，在行动中总是能彼此真诚合作，协调行动，求得共同的胜利。共产党执政后，还有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问题。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之间的关系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关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过去总认为，既然有着共同的社会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共同的理论基础，彼此间总是互相帮助，互通有无，全面合作，以求得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和发展。所以，“同志加兄弟”、“牢不可破”、“友谊常青”这一类形容相互团结一致的美丽辞藻，常见于文件、书刊、贺电。对于彼此间存在的矛盾和分歧，不是被忽视、掩盖，就是被强行压制，其结果是“蓄之既久，其发必烈”，使矛盾和分歧不断加剧，最后发展到相互敌视，甚至兵戎相见。象认识世界上所有事物都有差异一样，怎样正确认识和处理共产党之间、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分歧，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现实问题。如果不认真总结这方面的经验教训，当矛盾爆发出来甚至以冲突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时候，仍然以那种过于理想化的理论禁锢自己，那就不仅使人们陷入迷惘之中，而且很可能又要重蹈过去那种从简单的指责对方“变质”、“背叛”中去寻根究源的覆辙。100多年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史，党际关系中的恩恩怨怨的教训，为我们总结、探求这方面的规律，提供了大量的史实材料，做好这一工作，对今后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发展

展，无疑是有重大价值和现实意义的。

二、党际关系的历史演变

无产阶级要求国际团结，渴望建立国际联系的思想和精神早已有的，这种思想真正在组织上体现出来，是在19世纪的40年代。1847年建立的共产主义者同盟，是世界上第一个建立在科学社会主义基础上的具有国际性的无产阶级政党组织。列宁说过：“同盟虽然很小但却是真正无产阶级政党”。^①由于它本身是一个国际性的而非民族国家范围内的政党组织，所以还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党和党之间的关系问题，当时存在的是如何处理与其他工人政党的关系。对待已经形成的其他工人政党，“同盟”认为应当同它们一道去完成共同的最近目标，即促使无产阶级形成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对待其他社会主义的民主党派，“同盟”注意了联合它们去反对保守派和激进派的资产阶级，但对它们的空想则采取批判态度；对待资产阶级政党，“同盟”认为可以同它们一道去反对君主专制、封建土地所有者和反动市侩，但是，共产党一分钟也不忽视教育工人尽可能地明确认识自己和资产阶级利益的根本对立，以便在资产阶级革命胜利之后，无产阶级能够利用资产阶级革命胜利所带来的政治的和社会的条件，立即开始进行反对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

1864年建立的第一国际，不是无产阶级政党，更不是国际共产党，马克思称呼第一国际为“协会”、“联合”、“联合起来的团体网”、“各国工人团体进行联络和合作的中心”、“工人阶级的国际纽带”。恩格斯也经常说第一国际是“国际工人联合组织”、各个派别的“幼稚合作”、各国工人阶级的“形式的联盟”、“形式上的同盟”。恩格斯在1873年4月参加起草的一份

^① 《列宁全集》第19卷，第292页。

国际文件中明确地说“国际工人协会不是别的，而是为了本阶级的经济解放而团结起来的各国工人的联合。”这是因为各国工人起来斗争后，各国资本家和各国统治阶级总是联合起来对付工人。各国资产阶级虽然在世界范围内，在世界市场上进行着激烈的竞争，甚至在战场上互相厮杀，但是在对付工人和被压迫人民群众上它们都是一致的。斗争的实践使各国工人认识到，各国劳动人民的国籍虽然不同，各国的情况虽然不一样，但是他们被压迫的处境是一样的。正是在这样认识的基础上产生了联合的愿望和联合的行动，第一国际也就应运而生。

参加第一国际的除了反映无产阶级利益的科学社会主义派别以外，还有反映其他阶层利益的形形色色的非科学社会主义流派，甚至一些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也参加了国际，如主持第一国际成立大会的主席比斯利教授就是一个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他是伦敦大学历史学和政治经济学教授，孔德的门徒。参加第一国际的有蒲鲁东主义者、拉萨尔主义者、工联主义者、巴枯宁主义者等。不同的派别，就有着五花八门的观点。但这些非科学社会主义学说派别，他们有一个共同的愿望，那就是都反对资本主义。也正因为有着这样一个共同基础，大家才聚到一起组成第一国际。马克思恩格斯处理与各派别间的关系，这对我们今天研究党际关系是有着借鉴意义的。

在第一国际选出的总委员会中，拥护科学社会主义的是少数。1864年9月28日大会选出的总委员会32人中，属于科学社会主义的只有马克思和埃卡留斯两人。马克思并没有名义的领导者身份，他只担任德国通讯书记职务，而且他本人对那种追求首领的行为十分鄙视。有一次马克思给“协会”荷兰书记南·菲力蒲斯的信中风趣地写道：“‘领导’从来就是令人不愉快的事，所以我绝对不去追求它。我一直记着你的父亲关于托尔贝说的一句话：‘赶驴子的人总是被驴子憎恨的’。但是，一旦认真地做我认为

重要的事，我这个不安分的人当然不愿意让步。”^① 马克思没有担任第一国际的最高领导人，但自从马克思起草了“协会”的《成立宣言》和《共同章程》以后，他就牢牢地掌握了“协会”的领导权。马克思是公认的“协会”的真正的领袖、总委员会的灵魂，就连阶级敌人攻击马克思时也说他是“国际的最高首脑”。

马克思在处理与其它流派关系时有这样几点是值得注意的：第一，承认矛盾和分歧，先把它团结过来，吸收加入国际，然后以细致的思想工作，促使矛盾的转化。当时工人运动中的不少宗派阻碍着运动的发展，要解决这个问题，马克思的做法是把这些宗派先吸收到阶级运动中来，然后加以溶解。为此，第一国际向一切流派敞开大门。这一指导思想具体体现在马克思起草的《共同章程》之中。第二，引导和等待。第一国际内对待非科学社会主义派别，并不一开始就采取激烈的斗争方式，而是耐心引导，等待觉悟。诸如工资问题、合作社问题、工会问题、权威问题、土地问题、教育问题等等，各派都有自己的看法，马克思总是以准确的语言晓之以理。马克思在第一国际中只做过一次大报告，这就是后来发表的《工资、价格与利润》一书。其余都是采取共同探讨的方式，以理服人，逐渐达到认识上的一致。第三，认识问题以理论宣传来解决，断不可动辄以组织制裁。蒲鲁东主义者托伦之所以被开除出第一国际，并不是因为他持蒲鲁东主义观点，而是因为他投靠凡尔赛反动派；奥哲尔之所以从国际总委员会中除名，并不是因为他持工联主义观点，而是因为他背叛工人阶级，拒绝在总委员会关于巴黎公社的宣言上签字；巴枯宁之所以被开除，也不是他散布无政府主义观点，而是他搞阴谋分裂活动。第四，注意到各国工人阶级流派的独立自主问题。第一国际只要求各国工人阶级走向解放目标，至于采取什么形式，应当由这个国家的工人阶级自己选择。但为了粉碎巴枯宁的分裂破坏活动，制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507页。

止所谓的“自治”，马克思恩格斯曾致力于扩大总委员会的权力，加强集中领导。

正因为如此，第一国际初步实现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伟大战略要求；为马克思主义在工人运动中取得支配地位准备了条件；为各国工人阶级建立民族国家范围内独立的政党奠定了基础。

1889年7月14日成立的第二国际，是各国社会主义政党出现之后建立起来的无产阶级国际联合组织。从此，在国际共运中正式出现了具有严格意义上的党与党关系的问题。

第二国际组织，它没有正式的名称，以每隔几年举行一次国际代表大会作为自己的主要活动方式；1900年以前，没有固定的常设机构，只是由上届国际代表大会确定下届大会的时间和地点，委托当地的工人政党组成筹备委员会，负责大会的筹备工作。1900年，成立社会党国际局作为第二国际的常设机构，但在1907年以前没有正式的组织章程，直到1907年斯图加特代表大会才通过了《国际代表大会和国际局章程》。第二国际一个显著的特点是，参加第二国际的各国社会主义政党是独立自主的，没有一个凌驾于各国党之上的国际领导机构。由于每个国家的情况不同，工人阶级的觉悟水平不一样，各国工人阶级政党所面临的任务也不一样，因此，第二国际强调各国党的路线、方针由各国党自己制订，活动方式、斗争策略由各国党自己选择，任何一个大党和国际组织都不应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其他政党。在国际代表大会上，每个党平等地讨论问题，大会作出的决议对各国党只有道义上的约束力，没有任何强制性。社会党国际局书记胡斯曼1907年在一次报告中说过，由于各国党都是独立自主的，因此，“不能排除因为环境的多样性而成为必要的自主性。”^①可以说，独立自主的原则在第二国际中是得到正式承认的。有这样

① 转引自：《国际共运史讲座》，华东师大出版社，1989年版，第139页。

的原则不等于说大家都能百分之百的遵守。如俄国社会民主党党内发生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的分歧和斗争时，第二国际曾不恰当地干涉过俄国社会民主党内部的分歧。这种干涉，理所当然地受到布尔什维克和列宁的坚决抵制。列宁说：“我们是自己的党，这一点要牢牢记住，任何人无权把别人的意志强加给我们，国际社会党执行局也无权这样做。”^①

第二国际社会党国际局书记处的主要任务是，收集情报资料，通讯联络，出版会议记录等。由于第二国际的主要活动方式是每隔几年召开一次国际代表大会，大会的决议对各国党也只有道义上的约束力，没有任何物质上的强制力量；各党之间的关系是独立自主、平等的。因此，作为常设机构的社会党国际局，不是凌驾于各国党之上的领导机构，更不存在拥有对各党有强制作用的物质力量。

总的看来，第二国际是一个比较松散的国际联合组织，每隔几年召开一次国际代表大会，讨论一些重大问题和斗争策略，国际代表大会所作出的决议对各国党没有强制性的约束力，由于在1910年以前大多数的决议比较正确，各国党还是执行了，列宁说，各国党“不遵守决议的情况实际上可说是绝无仅有的，恐怕比各国党不遵守本党代表大会决议的情况还要罕见”。^②正因为如此，第二国际在1910年以前的活动（即机会主义占统治地位以前），加强了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促进了各国独立的工人阶级政党的建立和发展。

如果说第二国际是一个组织比较松散，各国党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独立的话，那么，1919年建立的第三国际，则是一个有着严密组织原则的世界共产党，党与党之间的关系实际上存在着领导党和被领导党之分。根据《共产国际章程》规定，共产国际是一

① 《列宁文稿》第6卷，第128—129页。

② 《列宁选集》第1卷，第742页。

个“统一的世界性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的各国党是它的支部，第三国际的目标，就是要“建立世界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联盟。”第三国际要求严格地执行民主集中制原则，加入第三国际的党必须服从第三国际执委会的决议，对不执行决议或违反第三国际纲领章程的党和成员，第三国际可以绳之以纪律，直至开除出第三国际；各支部的中央领导成员的任免必须征得第三国际执委会的同意方能生效，各支部的纲领由第三国际执委会批准；执委会有权指定自己的特派代表参加支部的一切会议。总之，第三国际执委会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力。由于当时苏联共产党是唯一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党，又是一个大党，列宁、斯大林又是公认的世界无产阶级的导师，因此，苏联共产党在第三国际中处于实际的领导地位、支配地位，它在很大程度上掌握着执委会的全部工作，其他共产党则处于不平等的从属地位。列宁在世时，曾经批评第三国际最初几年里俄国党扮演指挥党的苗子，告诫大家要防止这种倾向的发展；但仔细研究，我们不难发现，列宁的意见是针对防止把俄国经验强加给别国党而言的，而不是针对第三国际的组织原则——即集中制而言的。历史证明，在一个党内，实行民主集中制原则是必要的，在发扬民主的基础上，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是完全正确的。但作为一个国际组织的原则，各国党都要听从远离本国的一个国际中心的命令，听从俄国“领导党”的指挥，这就必然使各国党失去独立自主的地位，不可避免地在实践中要发生路线、方针、政策上的偏差，不可避免地要导致党与党之间的不正常关系。列宁逝世以后，第三国际这种集中制原则，终于发展到粗暴地干涉兄弟党的内部事务，第三国际组织领导体制上的弊病，由于苏联共产党作为实际上的领导党的存在，变得更加严重，使一些国家的革命遭到严重挫折，在国际共运中带来了许多消极的后果。波兰共产党的被解散就是突出的一例。

应该肯定，第三国际有着不可磨灭的功绩，如，传播马克思

主义，反对机会主义思潮；帮助各国工人阶级建立了政党；支援了各国工人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开展了反对法西斯主义的斗争等等。但在处理党际关系上的一系列做法，是极不正常的，一个党的经验再好，别国党在运用时也要结合本国实际才能见效，照搬照抄或由外来力量强制推行，其结果必然是负效应。

由于对第三国际时期党与党关系中出现消极后果没有从正面总结经验教训，也由于第三国际解散后苏联共产党仍以老子党、指挥者自居，因此，不少党的政策，仍然随着苏联的政策变动而大幅度地摇摆。战后成立的共产党情报局虽然规定是互通情报、交流经验性质的地区性国际组织，但苏联共产党还是继续沿用了第三国际的方法，通过国际组织制裁不听其指挥的兄弟党，情报局开除南斯拉夫共产党，这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开了一个影响恶劣的先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亚出现了一大批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样除了党际关系外，还存在着社会主义国家间的关系。1957年《莫斯科宣言》经过协商提出3个原则：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完全平等、尊重主权、互相援助。1960年《莫斯科声明》又明确提出3点：“所有马列主义政党都是独立的、平等的……并且相互支持。”《莫斯科声明》还肯定各国党要就共同的问题举行国际会议，协商一致，协调行动。1957年和1960年两次莫斯科会议经过共同讨论，互作让步，达成了一致的协议。但问题是有了国际会议国际文献后，党际间仍然存在着不少分歧，而且当分歧出现后，分歧的政党各执己见，都指责对方违背了《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60年代初，苏共领导人企图以势压人，想继续沿用第三国际的组织原则，以少数服从多数的办法解决矛盾。1963年苏共领导人提出要召开国际会议，讨论国际共运总路线，硬要兄弟党接受苏共的总路线，这样就挑起了一场国际共运内部的大论战。

这一场大论战逐步升级，愈演愈烈，终于发展为国家关系的破裂。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在存在的40余年中，互相间以武力相威

胁以及发生武装冲突的重要事件就有过多起，这给有关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以及社会主义在世界上的声誉带来了严重的损害。

三、我们的写法

从1869年世界上出现了第一个民族范围内的工人阶级政党——德国社会民主党以来，共产党的队伍虽然历经沧桑，但总的趋势是在曲折中不断发展壮大。第二国际时期有27个工人阶级政党，第三国际时期有76个政党。今天，统一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组织已不复存在，加上党的组织分化、合并、停止活动的事经常发生，因此，对世界共产党以一个确定的标准进行统计，是很困难的。据不完全统计，全世界约有280多个共产党仍在活动。共产党人数量的发展也是非常迅速的，1939年，全世界共产党员总数为420多万，目前的总数已超过8,000万，占世界人口总数的1.73%。这显然是一支举世瞩目的宏大队伍。在地区分布上，过去，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点在欧洲。现在，共产党的队伍已遍及世界每个角落。亚洲地区的人数已大大超过欧洲而居世界首位，这就改变了国际共运以欧洲为中心的历史情况。共产党在各国的地位和作用，那是很不一样的。有执政的，有参政的，有在野的，有合法的，有非法的，等等。

如果要把数量这么多、情况这么复杂的党际关系按照排列组合写周全，那是一个浩大的系统工程，完成这个工程，显然是在我们目前主客观条件下所难以办到的。为此，我们只能择其重点，写几个党际关系中有代表性的主要的党与党之间的关系。

从共产国际开始，由于种种历史和现实的因素，把苏联共产党推向了党际关系的中心位置，因此，我们如实地重点写了苏联共产党和各主要国家党的关系。

编写党际关系史，这是我们的大胆尝试，虽然经过参加编写

同志们的共同努力，书是写出来了。完成书稿后，我们总感到有点勇气有余，水平不足。丑媳妇不怕见公婆，我们拿出这部书稿，诚心诚意听取专家、同行和广大读者的意见，互相切磋，提高认识，以利进一步修改。

参加本书撰稿的有：第一部分《导论》姜琦；第二部分《早期共运中几种不同类型的关系》万中一、王志连、张月明；第三部分《共产国际时期党际关系的历史特征》周尚文、赵永峰、张月明、孙锡安、李明、张祥云；第四部分《二战后更趋复杂的党际关系》姜琦、张月明、田娟玉、范军、包文英、杨烨、陆钢、冯绍雷、鲍盛钢；第五部分《理论、形势与展望》姜琦。全书由姜琦、张月明、冯绍雷统稿。在编写过程中，我们得到华东师大出版社第二编辑室主任丑立本副编审和责任编辑王子奇同志的大力协助和指点，吸取了同行专家们的研究成果，在此表示衷心谢意。